

中国互联网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动力重构

张 磊 张 鹏

摘 要 人口红利及其带来的规模经济日趋消失,市场需求开始出现进一步细分和服务化的趋势,这些都对中国提出了通过互联网经济发展重构增长动力的时代要求。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迫使企业只有充分运用互联网技术和更加灵活的市场机制配置创新要素,才能有效消化营销、管理和研发等广义交易成本,保证企业盈利和创值能力的稳定提升,重构增长动力。然而,即使作为互联网经济最高发展水平的代表,美中概股市场的互联网服务业上市公司也只是处于颠覆性创新的初、中期阶段,其对互联网技术和市场配置机制的应用,尽管起到了明显节约广义交易成本的作用,但与实现创新驱动的内生增长目标还有很大距离。因此,需要全面深化政府动员性市场体制改革,进一步发展互联网经济重构增长动力。

关键词 互联网经济;增长动力重构;政府动员性市场体制

中图分类号 F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263(2016)12-0007-08

DOI: 10.15937/j.cnki.issn 1001-8263.2016.12.002

作者简介 张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北京 100836;张鹏,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北京 100836

2011年以来,人口红利及其带来的规模经济日趋消失,市场需求开始出现进一步细分和服务化的趋势,这对中国提出了重构增长动力的迫切要求。当中国人口红利加快消失时,企业将无法再继续通过规模经济充分消化生产成本,势必会造成企业毛利率下降。企业只有充分运用互联网技术和更加灵活的市场机制配置创新要素,才能有效消化营销、管理和研发等广义交易成本,保证企业盈利和创值能力稳定,重构增长动力。因此,互联网经济发展无论在双创战略的推进上,还是在供给侧改革的实施中,都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本文以互联网经济中的服务业上市公司为代表,来探讨中国互联网经济发展重构经济增长的实际效果及其面临的体制障碍。

一、互联网经济发展对重构增长动力的经济解释

2011年以来,中国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引发

了经济增速的不断下滑,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人口红利趋于消失。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3)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由劳动力供给增长所带来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目前,中国劳动力供给已经进入绝对减少的“拐点”区域。2015年之后,劳动年龄人口持续下降及相应劳动供给持续减少将成为常态。第二,市场需求出现进一步细分和服务化趋势。张平等(2014)集中探讨了人均收入水平与市场结构的关系。他们发现,当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以上的中高收入阶段,需求集中度将出现迅速和明显的下降,进入到厚尾的市场结构。随着多样性需求的不断提升,人们的物质需求下降,服务需求大幅上升,经济增长从赶超速度向可持续增长回归。当人均GDP达到12000美元的高收入阶段,特别是突破20000美元时,多样性需求将进一步转向定制化的需求,长尾的需求分布是其特征,服务业占比超过70%。人口红利及其带来的规模经济日趋消

失,市场需求进一步细分和服务化已经构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常态。

当一个经济体存在人口红利时,由于集中性需求的大众市场规模巨大,不仅企业容易达到最小有效经济规模(MEC),而且可以在此基础上通过“干中学”和资本广化等机制实现规模经济。此时,只要扩大生产规模,就能有效降低生产成本并开拓市场。这在微观层面就表现为企业较高的毛利率,并允许较慢的资产周转率和较高的杠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人口红利消失时,多样性需求的利基市场所能容纳的最小有效经济规模较为有限,并同时压抑规模经济。由于无法通过规模经济充分消化生产成本,这势必导致企业毛利率下降,为了确保企业盈利并实现动力扩张,只有通过充分运用互联网技术和更为灵活的市场机制有效配置创新要素,才能降低营销、管理和研发等广义交易成本。克里斯坦森等(2015)运用颠覆性创新概念对动力重构的企业微观基础进行了系统阐释。该研究认为,产品或服务的性能改进和质量提升速率通常会快于市场有效需求,根据产品寿命周期的不同,企业竞争重点将依次从产品或服务的性能和质量可靠性转向便利使用的可获得性,以及低成本和价格上。为此,企业在产品寿命周期的不同阶段需要分别采用问题解决、增值服务和互助网络商业模式。其中问题解决模式是指主要依赖企业雇佣的专家,运用专业直觉及其积累的人力资本协同探讨复杂问题的起因,然后向客户推荐解决方案来创造价值,主要用于应对产品或服务性能和质量的可靠性竞争;增值服务模式则主要依赖企业优化流程稳定地以低价格提供高质量的产品来创造价值;互助网络模式则主要依赖互助网络中的参与者(客户)的交换活动来获取关于产品或服务的供求信息 and 知识。克里斯坦森所提出的颠覆性创新在本质上属于低成本质量升级竞争战略,最终必须依赖增值服务模式实现技能知识化和服务商品化来有效降低生产成本。不过,考虑到颠覆性创新起步于多样性的利基(边缘)市场,规模经济的丧失势必严重压抑生产成本的下降,再加上有关创新市场的来源和规模信息匮乏,具有很大不确定性,这就意味着至

少在颠覆性创新启动的初、中期,企业只能依赖市场试错机制来消化营销、管理和研发等广义交易成本。根据伊斯利和克莱因伯格(2011)的研究,市场试错机制在本质上属于基于广度优先搜索的网络搜索和供求匹配过程。颠覆性创新对市场试错机制的依赖,就为企业引入问题解决和互助网络模式,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开辟了广阔的空间。互助网络模式与问题解决模式中作为知识生产-消费共同体的专家系统有类似的地方,只不过互助网络中的参与者来源和范围更为广泛。这两种商业模式都要求企业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促进网络参与者(节点)积极互动以实现知识和信息的高质量生产和外溢效应,从而消化营销、管理和研发等广义交易成本。其中问题解决模式可以确保专家知识外溢,降低创新成本,而互助网络模式则补充了不可或缺多样性市场需求信息。由此可见,引入颠覆性创新模式就是要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和更加灵活的市场机制完善创新要素配置,从而消化营销、管理和研发等广义交易成本,直至最终降低生产成本。很显然,颠覆性创新模式的引入可以缓解人口红利和相应的规模经济的消失,以及市场需求进一步细分和服务化所带来的企业盈利能力下滑和扩张动力不足等难题。

颠覆性创新对实现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颠覆性创新不仅可以完成创新所必须的人力资本积累(如问题解决模式),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可以通过充分运用互联网技术和灵活的市场机制完善创新要素配置,有助于降低创新成本,从而成功地解决了利基(边缘)市场创新动力不足的难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随着人口红利及其带来的规模经济日趋消失,市场需求开始出现服务化和进一步细分的趋势,互联网经济发展和相应的市场体制完善将在中国经济增长动力重构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中国互联网经济发展的效应:一个例证分析

为了便于考察互联网经济发展及其对增长动力重构的影响,本文选择A股、港股和美中概股市场上与互联网关系密切的中资非金融服务业和制造业上市公司分别进行分析,其中港股中资公

司由 H 股、红筹股和中资民营股(非 H 股)市场上的企业共同组成。互联网经济中的非金融服务业上市公司(下文均简称为互联网经济中的服务业上市公司)主要依据 wind 三级行业,并辅之以四级行业标准进行分类。概括起来,互联网经济中的非金融服务业主要包括:(1)专业服务中的调查和咨询服务、人力资源与就业服务,从属于工业大类;(2)消费者服务中的酒店、餐馆与休闲、综合消费者服务(含教育服务、特殊消费者服务)、媒体、零售业中的互联网零售、售货目录零售,从属于可选消费大类;(3)医疗保健设备与服务中的医疗保健提供商与服务、医疗保健技术、制药、生物科技与生命科学中的生物科技、生命科学工具和服务,从属于医疗保健大类;(4)软件与服务中的互联网软件与服务、信息技术服务(含信息科技咨询与其它服务、数据处理与外包服务)、软件,从属于信息技术大类(如表 1 所示)。

表 1 互联网经济中的服务业

所属 wind 行业 (一级行业)	所属 wind 行业 (二级行业)	所属 wind 行业 (三级行业)	所属 wind 行业 (四级行业)
工业	商业和专业服务	专业服务	调查和咨询服务
可选消费	消费者服务 II	酒店、餐馆与休闲 III	
		综合消费者服务 III	教育服务
	媒体 II	媒体 III	
	零售业	互联网与售货目录零售	售货目录零售
		互联网零售	
医疗保健	医疗保健设备与服务	医疗保健提供商与服务	
		医疗保健技术 III	
	制药、生物科技与生命科学	生物科技 III	
		生命科学工具和服务 III	
信息技术	软件与服务	互联网软件与服务 III	
		信息技术服务	信息科技咨询与其它服务
			数据处理与外包服务
	软件		

有关信息显示 2002 - 2015 年美中概股市场的互联网服务业上市公司代表了中国互联网经济发展的最高水平,并带有明显的颠覆性创新特征:

1. 企业营业收入和总资产在剧烈波动中实现了加速高增长^①。如图 1 所示,在 2007 -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中国互联网经济中的服

务业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增长在所有市场均波动剧烈。在危机爆发后,在美中概股市场上,中国互联网经济中的服务业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在剧烈波动中高速增长,并呈现加速趋势,a 股和港股市场的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则实现了平稳增长。在营收增长良好态势牵引下,中国互联网经济中的服务业上市公司资产增长表现更为突出。如图 2 所示,在 2007 -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中国互联网经济中的服务业上市公司资产增长同样波动剧烈,但在危机爆发后,在 A 股、港股和美中概股市场上均出现了加速趋势,其中美中概股市场的上市公司资产增速加快最为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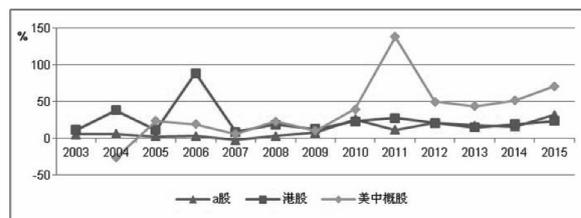


图 1 2002 - 2015 年中国互联网服务业上市公司的营收增长率

资料来源: Wind 资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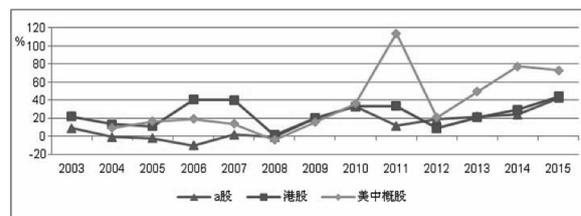


图 2 2002 - 2015 年中国互联网服务业上市公司的资产增长率

资料来源: Wind 资讯。

2. 规模经济消失,生产成本难于完全消化,以致企业营业成本占营业收入比重上升、毛利率下降。正如前面的分析所指出的那样,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企业面临的市场将进一步细分,直至最终演变成为多样化需求的利基市场,在这样的市场结构下是很难通过规模经济来降低生产成本的,从而使得毛利率下滑。如图 3 所示,在美中概股市场上,中国互联网经济中的服务业上市公司毛利率下降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在危机爆发前,从 2004 年的 68.79% 下降到 2008 年的 58.54%,危机爆发后除了 2010 年的一个高点外,

毛利率从2011年的48.34%进一步下滑到2015年的38.51%。与中美概股市场的上市公司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a股和港股市场上,中国互联网经济中的服务业上市公司尽管在危机前也经历了毛利率下滑的阶段,但在危机后毛利率却实现了稳中有升。中国互联网经济中的服务业上市公司危机后毛利率在不同市场的差异表现可能与其采取的创新战略存在莫大关系。a股和港股市场的上市公司可能采用了延续性创新战略,升级到高端市场进行竞争,以继续获取剩余的规模经济和相应的高毛利率。然而,由于高端市场规模经济不足,很难完全有效消化生产成本,从而使得企业营业成本占营业收入比重居高不下(见图4)。很显然,这种维持高毛利率的创新和竞争战略空间在人口红利和相应的规模经济消失后将会受到很大压抑。与此同时,中美概股的服务业上市公司则接受了人口红利和规模经济消失的现实,采用了颠覆性创新战略,从低毛利率的利基市场起步竞争。这在其逐步上升的营业成本占比上也得到了反映(见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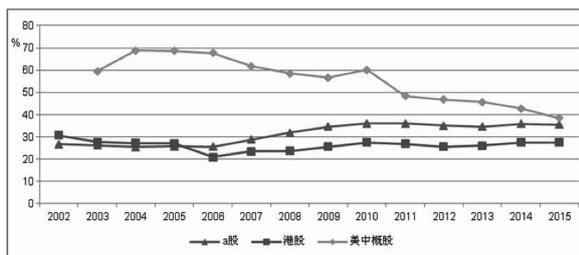


图3 2002-2015年中国互联网服务业上市公司的毛利率
资料来源: Wind 资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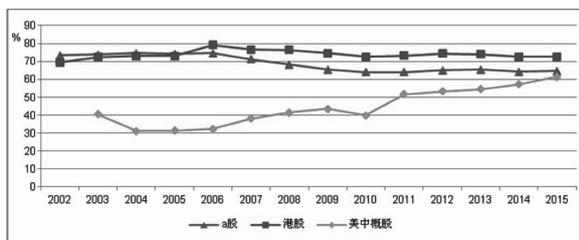


图4 2002-2015年中国互联网服务业上市公司营业成本占营业收入的比重
资料来源: Wind 资讯。

3. 充分运用互联网技术和更为灵活的市场机制配置创新要素,已经对由期间费用所代表的广

义交易成本产生了明显的节约效应,但还不足以完全抵消规模经济消失及毛利率下降给企业盈利和创值能力带来的负面影响。正如前面分析所指出的那样,当企业无法通过规模经济有效降低生产成本时,只有充分运用互联网技术和更为灵活的市场机制配置创新要素,从而消化研发和市场营销等广义交易成本,才能维持盈利和创值能力稳定,成功重启增长动力。如图5所示,在美中概股市场上,中国互联网经济中的服务业上市公司期间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从2003年高点的43.27%下降到2013年的低点19.49%,2015年也只有23.22%。然而,由于在美中概股市场上,中国互联网经济中的服务业上市公司营业成本占比上升以及相应的毛利率下降较快,广义交易成本节约效应对企业盈利和创值能力的改善受到了制约。如图6所示,从2011年开始,在美中概股市场上,中国互联网经济中的服务业上市公司销售营利率优势相较a股和港股市场明显缩小,以致2014年美中概股市场 and a股市场的有关服务业上市公司销售营利率竟然基本持平^②。由此可见,中国互联网经济中的服务业上市公司颠覆性创新尚处于初、中期阶段,其对互联网技术和市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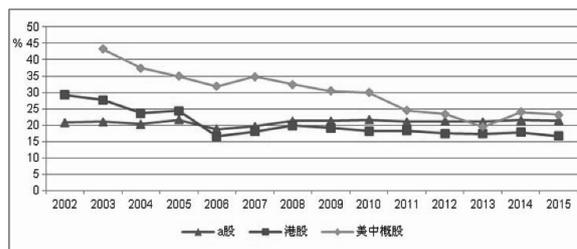


图5 2002-2015年中国互联网服务业上市公司期间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
资料来源: Wind 资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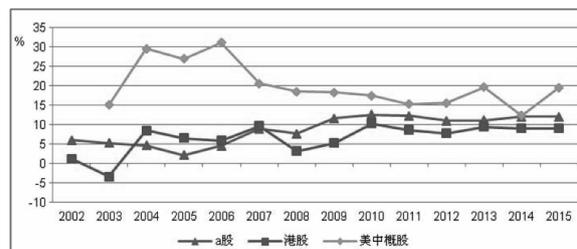


图6 2002-2015年中国互联网服务业上市公司的销售营利率
资料来源: Wind 资讯。

配置机制的应用起到了明显节约广义交易成本的作用,但离最终引入增值服务模式,实现技能知识化和服务商品化,从而有效降低生产成本还有很大距离。

4. 资产周转有所加快和杠杆平稳放大分别对由资产回报率(ROA)和净资产收益率(ROE)所代表的企业盈利和创值能力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作用。如图7所示,在美中概股市场上,中国互联网经济中的服务业上市公司资产周转率在2004年的低点为0.39,到2012年的高点则上升到0.67,其后虽有所下降,但2015年仍然达到0.55。正是在资产周转加速的积极推动下,美中概股市场的有关服务业上市公司得以确保ROA的相对优势(见图8)。在美中概股市场上,中国互联网经济中的服务业上市公司杠杆率稳中有升,确保其在绝大部分年份的ROE高于全国行业平均水平。与此同时,在a股和港股市场上,中国互联网经济中的服务业上市公司ROE却在许多年份低于全国行业平均水平(见图9和图10)。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a股和港股市场上,中国互联网经济中的服务业上市公司采用升级到高端市场进行延续性创新的战略,从而更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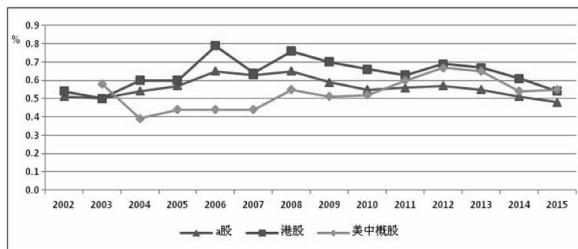


图7 2002-2015年中国互联网服务业上市公司的资产周转率
资料来源: Wind 资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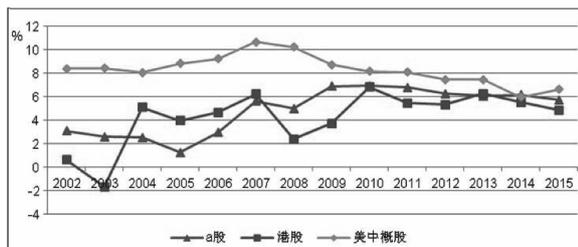


图8 2002-2015年中国互联网服务业上市公司的资产回报率
资料来源: Wind 资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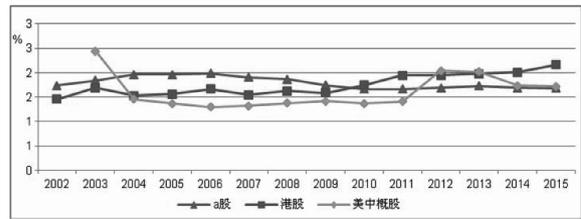


图9 2002-2015年中国互联网服务业上市公司的杠杆率
资料来源: Wind 资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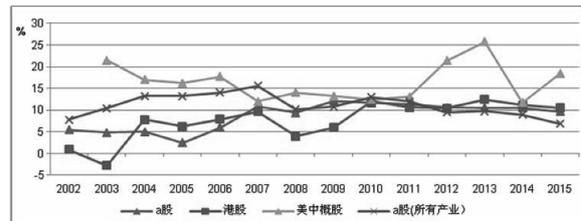


图10 2002-2015年中国互联网服务业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
资料来源: Wind 资讯。

地具有继续依赖规模经济的特征,在所有经济表现方面全方位地落后于美中概股市场的同类公司:(1)企业营业收入和总资产增加相对较慢。(2)剩余的规模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消化生产成本的作用,使得在企业营业成本占营业收入比重居高不下的条件下,还能保持毛利率基本平稳并略有上升,但毛利率的整体水平仍低于美中概股市场的同类公司。(3)受制于所采用的升级到高端市场进行延续性创新战略的影响,企业低且稳定的期间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使得节约广义交易成本对由销售营利率所代表的盈利和创值能力影响有限。(4)所采用的创新战略造成资产周转偏慢。(5)采用放大杠杆的方式改善企业盈利和创值能力,带来了金融风险的累积。很显然,在a股和港股上,中国互联网经济中的服务业上市公司毛利较低、广义交易成本节约有限、资产周转偏慢都损害了其盈利和创值能力,只得被迫放大杠杆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企业ROE。即使这样,在a股和港股市场上,中国互联网经济中的服务业上市公司ROE仍在许多年份低于全国行业平均水平,直到2012年这种状况才有所改观(见图10)。此外,偏高的杠杆还给企业营收和资产扩张的可持续性带来了隐忧。因此,美中概股市场的互联网服务业上市公司与a股和港股市场同类公

司在企业盈利和创值能力方面巨大的差异表现,有力地证实了当中国人口红利日趋消失以后,企业将无法再继续通过规模经济有效降低生产成本,只有充分运用互联网技术和更为灵活的市场机制配置创新要素,从而消化营销、管理和研发等广义交易成本,才能维持盈利和创值能力稳定,成功重启增长动力。

然而,即使是代表了中国互联网经济发展的最高水平的美中概股市场的互联网服务业上市公司,其颠覆性创新也尚处于初、中期,其对互联网技术和市场配置机制的应用起到了明显节约广义交易成本的作用,但离最终引入增值服务模式,实现技能知识化和服务商品化,从而有效降低生产成本还有很大距离。因此,通过互联网经济发展重构增长动力尚任重道远。中国互联网经济喜忧参半的增长效应也被互联网服务业(除金融)上市公司的TFP计量结果所证实。本文使用Levinsohn and Petrin(2003)的做法来估计微观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上市公司取对数后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 $y_{it} = \alpha l_{it} + \beta k_{it} + \gamma m_{it} + \varepsilon_{it}$, 其中 i, t 分别为公司截面和时间序列。 y, l, k, m 分别为取对数后的实际产出、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和中间产品投入。假定 $\varepsilon_{it} = \omega_{it} + \mu_{it}$, 其中 ω_{it} 为对生产率冲击的不可观测因素, μ_{it} 为随机误差项。本文使用营业收入作为产出的衡量指标,选取劳动力投入对数作为自由变量,代理变量仅有一项为中间投入。然后将得到的TFP值取对数即为一般意义上的全要素生产率。计量结果显示,2002-2015年,即使代表着互联网经济发展的最高水平,美中概股市场的互联网服务业上市公司所有年份的TFP增长率也是下降的,只不过下降速度较慢而已(见图11)。

综上所述,随着人口红利和相应的规模经济消失以及市场需求的服务化和进一步细分,中国企业普遍面临盈利能力下滑和扩张动力不足难题,并拖累经济增长。幸运的是,作为中国互联网经济发展最高水平的代表,美中概股市场互联网服务业上市公司却正在探索重构增长动力的新路,即通过引入互联网技术和更加灵活的市场机制配置创新要素,进行颠覆性创新,从而消化营销、管理

和研发等广义交易成本,并维持盈利和创值能力稳定。然而,美中概股互联网服务业公司同样处于颠覆性创新的初、中期阶段,其对互联网技术和市场配置机制的应用尽管起到了明显节约广义交易成本的作用,但与最终引入增值服务模式,实现技能知识化和服务商品化,有效降低生产成本,进而从根本上改善企业盈利和创值能力,实现创新推动的内生增长目标还有很大距离。这也被中国互联网服务业上市公司的TFP计量结果所证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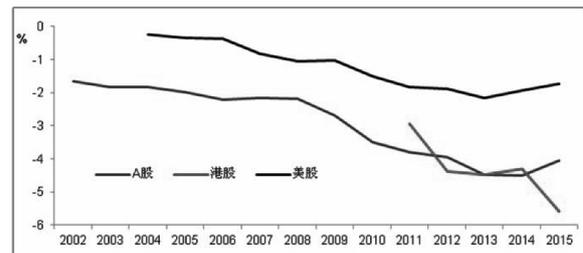


图 11 2002 - 2015 年中国互联网服务业上市公司 TFP 增长率 (%)
资料来源: Wind 资讯。

三、中国互联网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分析

中国互联网经济发展对重构增长动力的作用归根结底要受到经济增长方式和体制的制约。中国现有的经济增长方式及其配套体制显然是人口红利和相应规模经济的产物。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从存在人口红利的禀赋条件出发,选择了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的经济增长方式。这种增长方式在性质上属于由外部技术引进推动的国内要素和资本积累,干中学是其核心机制,规模扩张则构成其主要增长特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6))。与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增长方式相适应,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还发展出极具资源动员能力的政府动员性市场体制。张磊,张鹏(2014)将政府动员性市场体制概括为三大机制,即企业通过纵向一体化培育全供应链来获得干中学效应的发展战略、以增值税为主体的税制和国家隐性担保下的信贷扩张。无论是出口导向型工业化还是政府动员性市场体制,都是对斯密-杨定理的运用(Young, 1928)。根据该定理,增长是由各种不断增加的活动类型之间的劳动专业化分工所支持的。随着经济的增长,更大的市场使得企业能够支付生产更大数量

的中间投入所需要的固定成本,而这又会进一步提高劳动、资本的生产力,从而保持了经济增长。很显然,人口红利的存在是所有符合斯密-杨定理的经济增长得以运行的逻辑起点。只有人口红利所提供的庞大市场才能完全消化昂贵的固定成本,实现规模经济。有效动员储蓄,加速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深化专业化分工也才会收到加速经济增长的奇效。一旦人口红利消失,规模经济不再,中国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经济增长方式和政府动员性市场体制很快就会陷入困境。

在人口红利消失的条件下,政府动员性市场体制对企业盈利和创值能力的损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在人口红利消失的条件下,企业培育全供应链的发展战略,造成营销、管理和研发等内生广义交易成本难于消化。正如克里斯坦森等(2015)所指出的那样,几乎在每个先进行业的初始发展阶段,最初的产品和服务都是复杂且昂贵的。之后,人们通过使各种产品和服务变得更加简单和便宜,进而颠覆初始阶段的产品体系,最终使其大宗化。很显然,在产业发展的初始阶段,由于市场竞争的重点是产品或服务的性能和质量可靠性,企业就适宜采用延续性创新战略,通过纵向一体化将各种生产要素尽可能地整合进同一企业或企业集团内部,从而保证供应链的稳定。此时,尽管层级制的企业或企业集团信息传递链条偏长,加之代理成本的广泛存在使得广义交易成本居高不下,因而完全可以通过市场拓展产生的规模经济效应加以消化。然而,随着产业日趋成熟,市场竞争的重点将逐渐转向便利使用的可获得性,以及低成本和价格,这需要企业在专业化分工基础上引进问题解决、增值服务和互助网络模式,充分运用互联网技术和更加灵活的市场机制配置创新要素,实现企业组织内部的扁平化和组织之间的网络化,进行颠覆性创新,才能有效消化昂贵的广义交易成本。此时,市场开始走向服务化和进一步细分,规模经济的不足势必会压低毛利率,使其难以完全覆盖广义交易成本,进而损害企业盈利和创值能力。其次,以增值税为主的现行税制和国家隐性担保下的信贷扩张也分别抬升了企业税收和融资的外生广义交易成本。政府动员性

市场体制在性质上属于有管理的市场经济,即由发展型政府有选择地支持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通过纵向一体化培育全供应链,以增值税为主的税制则提供了政府广泛干预的激励。中国以增值税为主的现行税制就相当于对毛利先行征税,增值税起到了营业税金及附加的类似作用,无疑会直接抬升企业外生广义交易成本(昂贵的土地使用费也起到类似作用)。此外,曾经成功压抑银行利率的国家隐性担保下的信贷扩张在人口红利及其相应的规模经济逐步消失时也开始失效,银行风险溢价被迫上扬并牵引着企业融资成本迅速攀升。

因此,中国目前互联网经济发展对重构增长动力喜忧参半的效果与现行的政府动员性市场体制存在很大关系。政府动员性市场体制的三大机制显然都是为了充分利用人口红利及其带来的规模经济而设计的。以增值税为主体的税制和国家隐性担保下的信贷扩张分别从税负和融资成本角度抬升了企业广义交易成本。当人口红利消失和规模经济不在时,企业甚至连发展全供应链而内生的广义交易成本都不能充分消化,更不必说消化被人为抬升的外部广义交易成本了。这三方面体制障碍的共同作用压抑了中国互联网经济发展对重构增长动力作用的发挥。

四、小结

根据上面的分析,中国正面临着通过互联网经济发展重构增长动力的严峻挑战。从理论上讲,随着人口红利及其带来的规模经济的日趋消失,市场需求开始出现服务化和进一步细分的趋势,中国将从经济赶超时期的高速增长回归到可持续增长。然而,实现可持续增长并非必然之事。一方面,人口红利的消失将极大地限制企业通过纵向一体化实现规模经济,倾向于压低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互联网技术的兴起又极大地拓展了市场机制配置创新要素的范围,为适应市场需求的进一步细分和服务化、有效消化广义交易成本、保证企业盈利和创值能力稳定、重构增长动力带来了新希望。2002-2015年,美中概股市场的互联网服务业上市公司带有明显的颠覆性创新特征,代表了中国互联网经济发展的最高水平,与a股

和港股市场继续依赖规模经济的同类服务业公司相比,无论是企业的盈利和创值能力,还是扩张状况,都要卓越得多,这就是得益于对广义交易成本的明显节约和资产周转的加快。

因此,为了更好地通过互联网经济发展重构增长动力,中国需要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全面深化政府动员性市场体制改革。除了实现降低税收负担、融资成本和制度性交易成本等外生广义交易成本的目标,还需要放松经济管制,激励企业拆业已形成的全供应链,转而在专业化分工基础上引进问题解决、增值服务和互助网络模式,充分运用互联网技术和更加灵活的市场机制配置创新要素,实现企业组织内部的扁平化和组织之间的网络化,进行颠覆性创新,从而有效消化内生广义交易成本,重构增长动力。

注:

- ①由于在A股、港股和中美概股市场上,每年的上市公司数目不同,在本报告中,中国互联网经济中的非金融服务业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和总资产按照所在行业上市公司平均水平进行计算。
- ②销售营利率根据上市公司营业利润占营业收入比重计算而得。

参考文献:

- (1) Levinsohn, J. and Petrin, A. "Estimating Production Functions Using Inputs to Control for Unobservable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70, No. 2, 2003.
- (2) Young, A.,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Progress" *Economic Journal*, Vol. 38, No. 152, December, pp. 527-542, 1928.
- (3) 大卫·伊斯利、乔恩·克莱因伯格《网络、群体与市场——揭示高度互联世界的行为原理与效应机制》(中译本) 李晓明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 (4) 克莱顿·克里斯坦森、杰罗姆·格罗斯曼、黄捷升《创新者的处方:颠覆式创新如何改变医疗》(中译本),朱恒鹏、张旗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 (5) 张磊、张鹏《中国上市公司创值挑战和体制改革》,载《中国上市公司发展报告(201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 (6) 张平、王习、张磊、符晔、张鹏《中国经济从规模供给转向“需求-价值创造”——2014年经济转型和上市公司价值创造评估》,载《中国上市公司发展报告(201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 (7) 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中国经济转型的结构性特征、风险与效率提升路径》,《经济研究》2013年第10期。
- (8)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干中学、低成本竞争机制和增长路径转变》,《经济研究》2006年第4期。

(责任编辑:清 菡)

China's Interne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Economic Growth Momentum

Zhang Lei & Zhang Peng

Abstract: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and scale economy disappear gradually, market demand for more services and further subdivision requires China to restructure the growth momentum with internet economic development. When China's demographic dividend disappeared, the enterprises have to use the internet technolog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 allocating the innovation elements with more flexibility to digest generalized transaction costs such as marketing, management and R&D etc., ensure the enterprise profitability and the value creation ability stability, and restructure the growth momentum. However,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highest internet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the internet service industry listed companies of Chinese concept in the United States stock market are still in the early stage of disruptive innovation. Although applying the internet technology and the market allocation mechanism has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conservation of generalized transaction cost, these enterprises couldn't achieve innovation driven endogenous growth target. Therefore, we should deepen the reform of government mobilizing market system comprehensively and develop the internet economy further to reconstruct the growth momentum.

Key words: internet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reconstruction of growth momentum; government mobilizing market system